

翻译论坛

Translation Forum



南京大学

1
2016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与CNKI系列数据库全文收录

翻译论坛

Translation Forum

许 钧 主编

江苏省翻译协会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论坛. 2016. 1 / 许钧主编 ; 江苏省翻译协会、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编.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305 - 15891 - 9

I. ①翻… II. ①许… ②江… ③扬… III. ①翻译—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05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781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翻译论坛(2016. 1)

主 编 许 钧

编 者 江苏省翻译协会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杨 群 裴维维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23

照 排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6.25 字数 194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5891 - 9

定 价 2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翻译论坛》

顾 问: 张柏然

主 编: 许 钧

执行主编: 吴文智 周领顺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俞洪亮

副 主 任: 秦 旭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明伦	葛校琴	顾明栋	廖七一	罗选民
穆 雷	秦 旭	王 宁	王东风	王金铨
王克非	魏向清	吴文智	谢天振	许 钧
于建华	俞洪亮	仲伟合	周领顺	

目 录

译论纵横

- 论理想译者的多重身份——以庞德的翻译实践为例 顾明栋 1
- 异域的考验——*L'Étranger* 题名翻译之两岸译事 王汉琦 8
- 《阿 Q 正传》中语用前提英译评析——以杨译本和蓝译本为例 沈妍斐 17
- 乡土文学、乡土语言及其翻译研究 周领顺 高 晨 丁 雯 杜 玉 周怡珂 23

人才培养

- 西班牙语翻译练习中的语言迁移现象研究 张 琼 侯 健 28
- 韩国外国语大学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成功案例及启示 苑英奕 李婷婷 32
- 试议翻译研究论文写作方法和规范——以《论语》英译研究为例 张德福 36

批评鉴赏

- 从“车”看英汉认知的范畴化差异及翻译策略 轩治峰 41
- 《西游记》中析字方法的英译——以“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和“孙悟空”为例 朱明胜 51
- 国内高校网页英译研究 何 丽 田广山 56

译者研究

- 三秦大地与其译者群体——胡宗峰教授访谈录 许建忠 62
- 客居地译介——美国本德尔教授中国行 蔡 华 68

学术争鸣

- 学术术语的译用与汉语用语的规范——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identity”为例
..... 张金岭 73
- “翻译腔”之辨 施雪莹 77
- Habitus 与翻译选择 魏望东 83

图书评介

- 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研究的可贵探索——《语料库戏剧翻译文体学》评介 尹婧红 90

Main Contents

Test of <i>The Stranger</i> -cultural Study of Transl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bout the Title of <i>The Stranger</i>	Hanqi Wang
Translating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in <i>A Q Zheng Zhuan</i> —Critical Evaluation of English Versions by the Yangs and Julia Lovell	Shen Yanfei
Local Literature, Local Language and Its Studies	Zhou Lingshun, et al.
Studies on Language Transfer Phenomenon in Spanish Translation Exercises	Zhang Qiong & Hou Jian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South Korean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University's Successful Training of Translation Talents	Yuan Yingyi & Li Tingting
Discussion on Writing Method and Spec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i>The Analects</i>	Zhang Defu
On Differences in Categoriz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by a Cognitive Study of “ <i>Che</i> (车)” and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 <i>Che</i> (车)”	Xuan Zhifeng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ord Analysis Method in <i>A Journey to the West</i>	Zhu Mingsheng
Studies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mestic University's Website	He Li & Tian Guangshan
Sanqin Land and Its Translators—Interviewing Hu Zongfeng	Xu Jianzhong
From Trans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cademic Terms to Normalization of Chinese Vocabulary: Based on a Discussion about “Identity” in Researches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Zhang Jinling
A Debate on Translationese	Shi Xueying
Habitus and Translation Selection	Wei Wangdong
Exploration in Corpora Stylistic Translation Studies: Comment on <i>Corpora Stylistic</i> <i>Translation Studies of Drama</i>	Yin Jinghong

论理想译者的多重身份

——以庞德的翻译实践为例^①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 顾明栋

摘要:本文以“可读性翻译”和“可写性翻译”为理论架构,重新审视有关庞德汉诗翻译是否忠实的争议,结合庞德的翻译实践,对这两个概念给予了详细阐释。理想译者应如庞德那样,属于可写性翻译的译者,兼具着读者、学者、批评家、思想家和作家的身份特征。

关键词:可读性翻译;可写性翻译,理想译者;庞德

世界上有理想的译者吗?至少在理论层面似乎应该有。如果有理想的译者,那是什么样的译者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谓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借助两个新的概念“可读性翻译”(readerly translation)和“可写性翻译”(writerly translation),我们也许可以对这一问题从一个新的视角进行审视,找出新的答案。在此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可读性翻译”和“可写性翻译”的概念。这两个翻译概念受罗兰·巴特的阅读理论的启发,尤其是他的两个著名概念:“可读性文本”(readerly text)和“可写性文本”(writerly texts)。“可读性翻译”指的是译者消极接受和消化文本的翻译过程,关注的是传达作者在文本中设计和制造的意义。与此不同,“可写性翻译”指的是译者积极参与翻译过程,成为文本的合著者和意义的共创者。美国著名诗人庞德不仅是一位开创了英美现代派诗歌的伟大文学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翻译家,他从事的汉译英实践不仅为英美现代派诗歌的诗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就是其翻译量而言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尽管他的汉译英常被汉学家诟病。除了人们熟知其翻译的《华夏集》(Cathay)以外,他还翻

译了儒家的四书中的三部:《论语》(The Analects)、《大学》(The Great Digest)、《中庸》(The Unwobbling Pivot),和五经中的《诗经》(The Confucian Odes)。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第一部诗集,《诗经》一共有305首诗歌,英国著名汉学家威利(Arthur Waley)在20世纪30年代只译了290首,直到1996年才有人把威利没有译的15首译成英文。而庞德早在1954年就把《诗经》悉数翻译成英文。本文从“可读性翻译”和“可写性翻译”这两个概念提供的视角对庞德的早期翻译生涯进行审视,希望对理想译者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作为读者和学者的译者

虽然可读性翻译和可写性翻译在理论上是两个可以分开的概念,但实际上,二者一起构成认知和审美的发展连续体。翻译始于阅读,终于写作,这是连接可读性翻译和可写性翻译的纽带。如果一个人止步于可读性翻译,不思前进,那么,他就只能一直是被动读者。他最多能成为一名好的学者,但是,基本无望成为一流原创艺术家,其译著的成就至多也只能是由优秀的信息提供着。庞德同时代的美

^① 本文原为英文,由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薛武老师译成中文初稿,特此致谢。笔者对译文作了仔细的校对和修订,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国诗人及翻译家罗威尔(Amy Lowell)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她让一个懂汉语的人为她提供相当精确的汉诗解释,因此,在与庞德的论争中,她觉得自己的汉诗翻译要比庞德来得忠实,并引以为豪。不过,在艺术成就上,庞德的译文使她的翻译相形见绌。此中原因较多,这里,我冒昧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尽管罗威尔的翻译比庞德的更为忠实原文,但是,毕竟还是单纯的可读性翻译,这样的翻译可以让她成为一个平庸的学者,或者翻译批评家。她基本不能超越可读性翻译领域,就更谈不上进入可写性翻译领域了。

庞德的翻译生涯与罗威尔完全不同。和所有译者一样,一开始,他也是个读者,拘泥于阅读技术环节,即关注词汇、语法和其他语言元素。在早期,庞德接触弗诺罗萨有关汉语诗歌和语言的手稿,那些手稿属于可读性翻译范畴。1913年,当庞德被委以编辑这些手稿时,他基本不懂汉语。因此,只能依靠翻译来理解手稿中的汉字、诗歌和思想。为了认识汉字,庞德开始学习汉语,不过,他没有像一般外语学习者那样学习汉语,而是靠一字一句的翻译来学习。据说,当时庞德学习汉语的时候,使用的是汉英词典,那本词典是马礼逊的六卷本汉语词典。词典很好用,满足了庞德的需求,因为它能为汉字的每一个偏旁部首提供解释。在这个阶段,庞德的翻译明显属于可读性翻译。当然,可读性翻译方式也不是由庞德首创的,而是他从弗诺罗萨手稿中学来的,表现形式是直译和注解。编辑时,庞德也是把汉诗逐字翻译的。在出版弗诺罗萨的《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一书时,他附上几页注释,陈述他自己的翻译和注解。从这几页中,能粗略看出庞德如何处理汉诗汉字,怎样从可读性翻译向可写性翻译过渡。其中一页尤为有趣,让我们能够看出可读性翻译怎样引领庞德走上发现和创新之路。这一页有一首汉语诗歌翻译,庞德的翻译属于可读性翻译。

月耀如晴雪 The moon's snow falls on the plum tree;

梅花似照晃 Its boughs are full of bright stars.

可憐金鏡轉 We can admire the bright turning disk;

庭上玉芳馨 The garden high above there, casts its pearls to our weeds.

这首诗的翻译对于庞德非常关键,标志着他从可读性翻译到可写性翻译的转变。这是弗诺罗萨没有完成注释的一首诗,庞德说:“弗诺罗萨没有完成注释,编辑时,我完全不懂我在看什么,只能靠猜测。在一段时间,我觉得原文中的汉字就是一个个‘方块’。”大约在1914年,为了完成弗诺罗萨翻译和注释的编辑,庞德在字典的帮助之下,开始了他早期的翻译实践,也完成了从别人译作的读者向一个学者型的译者的转变。和很多汉学家一样,翻译古典汉语诗歌时,他也是逐词翻译的。但是,庞德走得比其他学者更远,他注意到汉字的构造。在所附的注解中,他给出了每个字的每个偏旁部首详尽的说明。比如,他把“月”分成两部分,分别是“日轮和月角”。“耀”字的注释是:“光+飞翔的羽毛/光,见42页边注。右上角,羽毛图像的缩微”;“下面是鸟=飞。弗诺罗萨和马礼逊都认为是一只短尾巴鸟”。“雪”的注释是:“雨+扫帚/雨滴上面有云罩/铺天盖地的雪;扫帚样的雪。”每一个汉字他都像这样注释。

庞德是一位原创作家,对于如此直译汉字,兴趣盎然,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甚至有点滑稽。进一步思考,才发现他近乎本能捕捉到了本雅明文学翻译观的真知灼见。本雅明提出类似于艾略特的“半透明”翻译观,他认为,“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不会遮蔽原文,阻挡原文的光芒,而是让纯洁的语言,带着自身的重量,完全地照耀在原文之上”。如何取得理想的透明?本雅明觉得这可以如此做到:“句法层面,最好直译,同时,要注意,翻译的最小元素是词,而不是句子。如果说句子是原文的高墙,那么,直译就是打通原文和译文的拱廊。”汉语的句法相对简单,但其词法极其复杂。庞

德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聚焦汉字的形态特征,比如象形、指事和会意,关注它们的词源。在他为翻译所做的长长的注解中,可以发现一些有趣之处:(1) 庞德严肃认真地直译汉字及其偏旁部首;(2) 他认真严肃地研究汉字的构造,关注它们的形声特征;(3) 注解时,庞德有效利用偏旁部首的诠释,把它当作语言的拱廊,创造自己的诗歌创作方法,这创作方法得益于象形汉字的构造法,最终演变为庞德著名的表意文字法。

显然,庞德不满足于仅仅作为读者,在学习汉字的图形构造法中,他开始成为一名学者,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

作为批评家和思想家的译者

若想成为一名好的译者,仅仅知晓如何阅读远远不够,他必须是一位敏感的读者,是个批评家。庞德就是这样,他能阅读文章的字里行间,解读文本背后潜藏的意思,发现原文中隐藏的关系。同时,他还是一名翻译鉴赏家,能够分辨好的和差的翻译。大家都认为庞德阅读弗诺罗萨手稿后才创造出自己的表意文字法,也许确实如此,因为这和弗诺罗萨对汉诗的理解有所关联。不过,弗诺罗萨的汉诗理解法并不完全,而且基本上是阅读方法,几乎没有涉及写作。庞德指出:“他至死也未能发表阐明自己的‘阅读法’。”“他试图说明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具有传达和表现思想的功能。”弗诺罗萨说的仅仅是阅读方法,如果将其发展成为写作方法,庞德在构思上必须向前跨一大步。

美国现代派诗歌学者们承认表意作诗法不仅仅是一种诗歌创作手法,同时也是美国现代主义运动潜在的美学原则。问题是,庞德如何构想出这个美学原则的呢?我的答案是:他是通过思想家的翻译途径达到的,这样的途径不是可读性翻译,而是可写性翻译。通过翻译汉字的偏旁部首以及诗行,他得以洞见潜藏于中国哲学、艺术和汉字构造法之中的玄学原则。在弗诺罗萨的书中,庞德附上一长条长的

注解,仔细审视这条注解和其他注释,可以发现庞德是如何汲取灵感以及得到启发的——这使他可以构想“意象主义”和表意文字法。前面我说过,弗诺罗萨和庞德的注释基本上是字面翻译,属于可读性翻译。不过,我觉得正是汉字结构的可读性翻译才让庞德有了知性和美学的飞跃,进入可写性翻译领域。作为思想家,庞德迷恋汉字的构造法,即部首笔画如何并置形成汉字。在中国语文中,这被称之为六书,即六种造字方式。出于这种迷恋,庞德成了语文学家和哲学家。他写道:“‘耀’字的第二个意符可以拆分为两部分,上面是火,下面是(行走的)人,缩略成光和下面行走的腿。一开始,应该是地平线下行走的太阳神,不管怎么样,都占据火意符的上方。这也适用于第二行第五个意符,其中,腿的形象更为清晰。在‘雪’字中,雨的意符可能指的是天幕,或者天棚。”庞德对汉字意符组成部分理解的错误可以忽略不计,需要关注的是他对意象表征、视觉图形的敏感以及汉字偏旁部首之间相关性的充满想象力的理解。庞德不知道中国的六书,但是,凭借诗人的直觉和令人艳羡的学者智慧,庞德准确捕捉到汉字偏旁部首间的相互关系,竟不知不觉体悟到汉字的六书:“在翻译中,对汉字表意符号、它们的内在联系、汉字偏旁部首的重复或者回复的研究,这些不仅存在于已经翻译的,还存在于翻译中暗示或者回避的地方。”

编辑弗诺罗萨手稿时,庞德附上了几张图表,展现了几十个汉字。图表下面,庞德用注释翻译法附上了汉字的详尽解释。过去,我以为庞德这样做是为了肯定弗诺罗萨手稿中得到的启发,但是,最近,我再次审视发现庞德其实在推导诗歌创新思想,这和我可写性翻译思想不谋而合。在注释中,他拆解每个汉字,利用字典,翻译偏旁部首,总结心得体会,最终使他构想出自己的诗歌创作技巧。

在所示第二张图表中,庞德给出三列汉字,同时提供注解,详尽阐释每个汉字偏旁部首的意义。他发现了汉字的画谜特征,这是汉

字构造,也是他自己表意方法的基础。庞德的注解说明,他已经在向自己的美学原则——表意文字法行进。在此,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在庞德看来,汉字“旦”中,“日”的形象被搁置于“一”之上,这个“一”是地平线,这样,“旦”字就形象地描绘出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这个字简直就是一张逼真的速绘图。这样的造词称为“会意”(字面上理解偏旁部首组合的意义)。这个汉字引申为崭新的黎明之意。“王”字他是如此注解的:“一个结合了三个纬度的人,天、地和人=统治者,统治。”对于“男”字,“稻田之上的劳作=男性。”“東”字,则为“太阳升起,光划过树枝=东方。”以上四个是汉字的正确注释,都遵循“会意”造字原则。对于其他一些汉字,他把汉字的造字法和自己的诗意洞见结合起来。比如说“古”字,他说:“口上有十=老,传了十代,十张嘴的传统。”在这个注解中,庞德觉得“古”代表一代代口头流传的传统。“十”和“口”并置,形成一个抽象概念。对于“伏”字,庞德写道:“人+犬(犬在人身边)=犬趴在人的脚边,或者爬向人的脚边,因此,可以表示躺下。”在这个注解中,“人”和“犬”并置,形成一个新的意义:“躺下。”

从上可以看出,通过翻译汉字偏旁部首,庞德得以知晓偏旁部首的彼此联系,并形成新的意义,这使他开始构想表意文字法。但是,如何将之用于一个更大的语言单位呢?他还得跨出一大步。虽然表意文字法对庞德诗歌创作十分重要,但至今还是有点令人觉得神秘。且不论庞德和弗诺罗萨研究中语言层面的不精确和失误,人们还是觉得难以理解汉字何以能够有助于英语诗歌创新。注解汉字偏旁部首时,庞德吸收了汉字造字原则,他还超越了弗诺罗萨的理解,考虑将表意文字法应用于更大的语言单位的可能。庞德的注解不乏不精确和谬误之处,但是,他能够从汉字构造原则向诗歌创作方法跨越,已经是革命性的一步,他成功地将汉字构造法运用于更大单位,即创造英语合成词、诗行、诗节乃至整个诗歌的创造。在汉字中,偏旁部首组合成字,受其

启发,创作诗歌的时候,庞德将单词、词组和句子并置,这些是意象、事件、文档和历史资料,如此,他达到了自己的双重目的,即同时呈现具象细节和抽象思想。

作为原创作家的译者

论及翻译,本雅明觉得翻译要能传达文学作品的精髓,而不是表面的信息:“一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表面信息外的……那不可测的、神秘的、‘诗意’的存在。”从他的话中,能看出他认为文学的精髓“只能是诗人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复制传达”。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译者除了必须是优秀读者、学者、批评家和思想家以外,还应该是原创作家。庞德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国文化学者,不过,他肯定是原创作家。他专注于汉诗以及其中汉字的字面翻译,这是他创造性翻译的准备。事实上,直译汉诗以及注解其中汉字的偏旁部首后,庞德便已离开可读性翻译,走向可写性翻译了。他以一位原创性作家身份进行翻译,感悟到可读性翻译中蕴藏的启发,并将其转变为可写性翻译的艺术原则。翻译《华夏集》诗歌时,庞德附上一个长长的注解。表面上,这个注解是份辩解书,以防别人批评他的翻译,仔细审视,可以看出他的注解其实揭示了庞德从读者到批评家、再到创造性译者发展的心路历程,展示他从可读性翻译向可写性翻译的转变。在此,有必要详细分析庞德的注解。在注解的开头,庞德给出一个解释:

我还没有读完弗诺罗萨的注解,不是因为他的注解让我感到困惑而使我不得不停止翻译。确实有这么一首诗,我不能给出什么别的解释:

“You know well where it was that
I walked

When you had left me.”

另一首诗中,我发现,直译起来近乎完美,但是,文法上很多人会觉得不能接受。诗行如下:

“Drawing sword, cut into water, water

again flow;

Raise cup, quench sorrow, sorrow again
sorrow。”

上面提到的是两行著名汉诗的直译,如果要严格按照英语语法和句法,应该如此翻译:“Drawing a sword to stop water from flowing, one finds water flows even faster; Using wine to wash away one's sorrow, one find one's sorrow becomes even stronger”(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弗诺罗萨的翻译违反了英语的语法和句法规则,但是,庞德觉得这样的翻译英语读者能够理解,这也和他意象主义诗歌思想相契合,预示了一个崭新的诗歌创作模式。庞德没有办法把弗诺罗萨的直译全部转变为可读性翻译,并且告诉我们个中缘由。不是因为弗诺罗萨的注解太长,也不是因为太难,而是因为庞德从中得到了启发,构想出自己创造性翻译和写作的诗艺。庞德继续说:

有些诗,尤其是“五色屏”,作为艺术批评家的弗诺罗萨教授特别感兴趣,还有李白的诗艺,即使善意的读者读起来也可能会反感。我大胆公开支持一些年轻艺术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再加上很多人对我个人有仇怨,因此,如果我把它包括在内,间插我个人的解释和枯燥的注释,可能会招致这些人指责译著中的谬误,进而贬损整部译作。这样,我只能收录毫无争议的诗歌。

对于自己不落俗套的翻译,庞德不无担忧,毫无疑问,会有人大唱反调,不过,他依然勇敢面对。《华夏集》中,他公开注明自己是译者。同时,向年轻艺术家推介自己发现的新的翻译模式,并称之为诗艺。因为敢于发表自己“有缺陷”的翻译,庞德知道自己会招致“仇怨”或者“不满”,给予他自信的不是“故去的弗诺罗萨的注释”,也不是“在破译层面莫利和阿列伽教授严谨的治学”,因为即使是庞德所说的“毫无争议的诗歌”对原文汉诗依然不够忠实。只要看看下面庞德翻译的四首离别诗之一就

一目了然了:

Light rain is on the light dust
The willows of the inn-yard
Will be going greener and greener
But you, Sir, 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
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
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

下面是王维的原诗和我的翻译:

渭城朝雨浥轻尘, The morning rain of
City Wei damps light dust.

客舍青青柳色新。 Greener is the guest-
house yard with new willows.

劝君更进一杯酒, I implore you, sir, to
empty one more cup of wine,

西出阳关无故人。 For you will have no
old friends west of Gate Yang.

庞德对这首诗的翻译相当忠实,但是,和原文相比,依然有很大差异。王维的是四行诗,庞德译成了六行。在原诗中,两位朋友喝酒已经多时,诗人敦促朋友再尽一杯。庞德的译文让人感觉他们尚未饮酒,远行的朋友似乎也不喜欢饮酒。最大的差异还在于“出阳关”,这个庞德是彻底忽略了,没有译出出阳关后的艰难历程,也就没有译出诗人对友人健康和安全的忧虑。尽管如此,阅读庞德的诗译时,英美读者会觉得这首诗和英文惯常的离别诗一样感人。其他诗歌的翻译也是这样。总而言之,庞德重写弗诺罗萨的注释,成为再创作的诗歌,表面上离原诗甚远,但实质上却忠实于汉诗的美学精神。同时,庞德的翻译读起来不像翻译,倒更像新鲜出炉的原创诗歌。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可写性翻译。

我基本上追溯了庞德出于对汉语翻译的迷恋,由读者转变为学者、批评家,继而是思想家和原创作家这一发展历程。在翻译的阐释空间内,有着多重身份的庞德流连于可读性翻译和可写性翻译的两极之间。带着读者的敏感和批评家的锐利眼光,他准确把握汉语的字

词如何联合概念和直觉、统一和多样、主体和客体以及抽象思辨和具体细节;带着学者的真挚和思想家的思辨,庞德发现将汉字的造字原则延伸至诗歌创作的可能;带着哲学家富有洞察力的眼光,庞德从汉字构造法中得到启发,知道可以通过并置具体意象表达抽象思想,获得内在的超越。这样,他才构想出意符作诗法,超越了西方玄学的局限,可以治愈英诗的种种疾病,如艾略特所说的“情感分离”,或者是庞德自己所说的“像肺结核般扩散的抽象化”。最后,带着原创作家的才智,他活用汉字的表征逻辑——不同偏旁部首的并置,将其发展为意符作诗法,这后来成为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核心创作手法。总而言之,庞德的译者生涯证明了可读性翻译和可写性翻译的辩证互动关系以及一名优秀译者的多重角色性质。作为译者,庞德没有勉强自己忠实地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而是试图再创造“原文在语言世界中激起的波澜,这样形成的译文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原文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回声”(本雅明的妙论)。

结论:理想译者——一位有着多重身份的作家

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构想出理想的译者,而实际上,理想译者的概念只是个神话。但通过概念化以及批评分析可读性翻译与可行性翻译,我们可以洞悉翻译的本质,知晓如何成为理想的译者。翻译不仅仅是把原文从原语言向目标语的转变,更是一个繁杂的阐释行为,其目的在于制造一个述行性连续体,在其中,译者同时又是读者、学者、批评家、思想家和作家。这样,阐释行为成了一个文本光谱,一极为可读性翻译,另一极为可写性翻译。可读性翻译常常服务于初出茅庐的作家,他可以通过阅读和翻译,发现新的主题、写作技巧、形式和风格,从而进行他的实验性创作。可写性翻译则是已成名的成熟作家的标志,他已经在文学的迷宫里找到了自己的出路。编辑弗诺罗萨的手稿的过程中,庞德经历了从最初的可

读性翻译到意符作诗法的转变过程。意符作诗法本质上建立在他洞察汉字的字面意义及其美学内涵的巧妙理解之上,这是通过翻译获得的。这一过程体现了以可读性方式挪用汉语翻译走向以可写性方式从事现代派实验性翻译的创造性过渡。比较他的翻译和复述,可以看出字面复述及注释的可读性翻译和发现创造的可写性翻译之间的联系。因此,我觉得一位学者的观点很有意思:“这样直接地谜一样地使用汉字”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实验性翻译,诗歌的深层表意结构建立于实验基础之上,形成一种翻译式创作。”翻译式创作是可写性翻译观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大家都认为翻译带有原创性,但是,对于原创性程度如何,就言人人殊了。有人觉得翻译是再创造行为,也有人认为翻译就是纯粹创造。可写性翻译不是纯粹的创造,而是基于原文的再创造,和可读性翻译紧密联系。

可读性翻译和可写性翻译的理论架构以及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分析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有关庞德汉诗翻译是否忠实的争议。作为原创性作家,庞德不满足于可读性翻译,认为只有可写性翻译才能满足他对新的诗歌语言和诗歌创作技巧的狂热追求。庞德的诗歌艺术发展历程证实了我的看法,即可读性翻译和可写性翻译之间紧密相关。其实,没有前者,后者便成了无源之水,而没有后者,前者便只能是光秃秃的树干,没有枝叶,没有果实。我的探讨没有能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理想译者,但是,足以启发我们去发现理想译者的成长轨迹:理想译者必须身兼数职,包括读者、学者、批评家、思想家和作家。也就是说,理想译者不仅仅是一个精通源语和目标语的优秀读者,也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发现原文中隐藏联系的敏感读者,还必须是一个通晓原文文化和目标文文化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学者,一个对文学高度敏感而且可以明辨译文优劣的批评家,一个可以把由阅读、研究与批评的灵感运用于翻译的务实思想家,以及一位出类拔萃的一流原创作家。庞德肯定不是一位理想译者,但是,他

的翻译实践给了我们足够的思想食粮去思考成为一名理想译者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对我们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尤其是汉英互译,也许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 Reflective, Critical, and Practical Essay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89-104.
- [2] Waley, A. (trans.). *The Book of Song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0.
- [3] Pound, E. (trans.). *Shih-jing: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4] Lowell, A., & Ayscough, F. W. *Fir-Flower Tablets: Poems from the Chinese*. Westport, CT: Hyperion Press, 1973.
- [5] Morrison, R.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u, China: Honorable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London: Black, Parbury and Allen, 1815-1823.
- [6] Fenollosa, E.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Ezra Pound (Ed.).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1968.
- [7] Benjamin, W.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 [8] Pound, E. *ABC of Reading*.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34.
- [9] Pound, E. (trans.). *Cathy*. London: E. Mathews, 1915.
- [10] Pound, E. A Retrospect //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35.
- [11] Parry, A. E. *Interventions into Modernist Cultures: Poetry from Beyond the Empty Scree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作者信息] 顾明栋,男,芝加哥大学博士,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和翻译中心教授。

异域的考验

——*L'Étranger* 题名翻译之两岸译事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王汉琦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西翻译理论逐渐从语言学过渡到文化研究,但部分国内外译本研究仍滞留在语言文字的评校,另一部分虽与时俱进,却过分侧重接受美学与意识形态的阐释,忽略原作、译作解读,并皆不甚注重译者生平与学识背景。因此本论文采用法国翻译学家安托瓦尔·贝尔曼(Antoine Berman)的文化翻译学的概念:《异域的考验》(*l'Épreuve de l'étranger*),以研究两岸加缪《局外人》七个译本题名为例,试以结合源头语、目的语的文化历史背景及译者立场,将翻译批评的相关问题窥豹一斑。

关键词:文化翻译学;译者研究;两岸;译本比较;《局外人》

本文取题“异的考验(*L'Épreuve de l'Étranger*)”,语带双关,一为所用翻译文化学的研究方法,系法国翻译学家安托瓦尔·贝尔曼(Antoine Berman, 1942—1991)的同名著作《异域的考验》(*L'Épreuve de l'étranger*, 1984)。此书名为一多义词:*l'épreuve* 意为试炼、考验,*l'étranger* 为外国的、来自异域的,在此指的是翻译文本,因此书名可指本国文化对翻译文学的试炼,亦可指异域来的文本带给母地的考验。二则 *l'étranger* 与研究课题加缪的大作《局外人》(*L'Étranger*) 同字,故题名指的是 *L'Étranger* 带给华语文学的考验,亦反之,华语文化予此文本的考验。

贝尔曼的文化翻译学以现代阐释学为依归,以人的精神为中心研究翻译文本,除了原作者,同样重视译者的立场(position)。加缪的《局外人》在台湾被译成《异乡人》,同一法文字,译成两个不同的中文词,文化意涵迥异。

本文的分析模型则参考《翻译批评:约翰·多恩》(*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1995),此为贝尔曼大去前不久之作,该书继《异域的考验》之后,再度揭示了一个翻译学的新阶段;古今中外,翻译批评仅限一隅,不仅着墨甚少,并以校对正误居多。20世纪80年代以英美为主的文化研究兴起之后,“文化”加持译本的正误,翻译研究开始豁

免“误译”,着重接受美学、意识形态的阐述,却仍忽视译者个人因素,又同时放逐了原作、译作的文本分析,成了另一种极端的现象。故本文将重点着墨在原作、译作中法双语的词义比较,两岸历史背景,译者立场与译作相关的部分,从而析究译名差异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原作 *L'Étranger* 的涵义

法语中 *l'étranger*, 可作形容词及名词。根据法语辞典(*Le Petit Robert*),约略有下列几层含义:1. 外国的、外国人,指的是移民、外交、国防、地理位置等方面。2. 不属于或不见容于某个团体,如不同的人、侵入者、第三者、外人。3. (指物)不寻常、不自然。同义于不认识的、奇怪的。4. (人)不知情、对某事物没有感情。5. (物)不正常。加缪的 *L'Etranger* 为辞典中第二个意涵之例句(*Le Petit Robert*, 1994)。而依照作者本人之意,题名紧扣书中意旨:“书中主角之所以被判刑,皆因其不遵守游戏规则”。由此观之,他不属于他生存的这个社会。”(加缪,七星文库)

二、两岸翻译文学之时代背景

1949年之后,两岸文学翻译路线分道扬镳。台湾方面,1949至1987年为政治上戒严时期。五六十年代,反共文学、战斗文艺、怀乡

文学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上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1950年至1965年因韩战、越战爆发,美苏冷战,台湾的战略位置重要,美国除了经济、政治上的支持,亦造成文化影响,推波助澜引进了许多反斯大林共产暴政的文章,并开始奉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为主臬,小语种作品多转译自英文。又,随着五四运动偏右派元老如胡适、梁实秋等人播迁来台,占据文艺领域重要位置,文学暨文学翻译上偏好温婉含蓄的风格。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逐步解除报禁、集会游行等各种禁忌,开放探亲,社会民风逐渐迈向开放。90年代以后,随政权转移,如今台面上已是政党轮替的民主社会,经济上越来越全球化、商业化、市场化,翻译文学方面也因此偏重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学。七八十年代以后的后殖民、文化研究炙手可热。基于学界、文化当局、教育体制等不注重翻译、缺乏小语种人才,出版社愈趋商业导向,大陆书籍涌入市场等种种原因,造成除英日语外,其他语种翻译萎缩或作品一枝独秀,许多作家的作品无系统翻译,如 *L'Etranger*、《小王子》、《情人》等因其轻薄短小的商业性质译作繁不胜数。而早在60年代即风行一时的加缪,至今仍无其作品全集(吴锡德语)。

中国大陆初时走向大异其趣。语言方面,倡导俗白的“大白话”,50年代注音符号改为汉语拼音,60年代起汉字系统简化。翻译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反传统、破四旧,遵循社会主义思想,又系统大规模翻译了苏俄的作品,其他地区译作亦多自俄文转译。1957年中俄交恶之后转为引介东欧、拉丁美洲地区等批判现实主义、民族主义作品。亦偶有引介部分欧美文学,但多斥为反动、颓废的负面教材,需批判性阅读。当时的革命文学仅遵以政治为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查明建,2001:66)。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俄苏文学的接受每况愈下,而本为反面教材的欧美文学则咸鱼翻身,却仍以左派为主,如萨特、加缪等。加缪的文风在文艺界影响不小,作家李劫、孙甘露、格非等皆有相关文章(朱大可,2006)。其他西

方各个流派译作如马尔克斯、海明威、昆德拉等亦颇受推崇,弗洛伊德、尼采等思潮也蔚为风尚。90年代,市场经济取向导致中产阶级价值观兴起,大众文学也越来越流行。

三、两岸翻译思潮异同之处

台湾地区始终重视儒家传统教育,以高中国文教育政策观之,根据1995年当地教育部门所颁布的文言文与白话文比例,文言文约占百分之七十,比1983年少百分之五,说明早期国民教育中,文言文比例更高,而文言文选材中,又以儒家思想为主。2000至2008年民进党执政期间,曾主张增加白话文比例、替换部分文言作品,以台籍作家为导向,以达成其“去中国化”、本土化之目的,引发论战。至今经过一番政党轮替,教材虽加重了台籍作家比例,却仍以传统儒家文类为主,文言文至少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白话文选材中不包括翻译作品。

查阅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科纲目,即发现不同之处。试验修订本必修第五册中,除现当代白话文选材取向不同之外,另有多篇翻译文学作品,如《变形记》、《百年孤独》等,另有现代主义(暨存在主义)的介绍,翻译文学选入课文似乎乃司空见惯之事。如2003年,辽宁人民出版社高中《课外语文》第二期,介绍存在主义,节选了孟安的译本。日前引起争议的是,北京部分区域已采用北京市高中课改教材,武侠小说为选修教材之外,必修部分删除部分文言作品,取而代之的有现代作家如余华、阿城的作品,另有部分翻译作品如加缪《西西弗的神话》(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市教改相关网页)。由于无法完整统计两岸教材文白历年比例,但泰半能确定的是,一方有翻译作品,一方则无,似乎可反映在两地人民对语文的逻辑概念及用法的差距,普遍看来,大陆文风直白,但较习惯使用西化句法。翻译方面,专有名词习惯源头语音译;反观台湾文本语句较文言、用词较典雅,在翻译上较偏意译,音译仍多以英文发音转译。电影译名、地名、人名是唾手可

得的范例,如 Camus 翻成卡谬,Canne 翻成坎城等,皆来自英语发音。

文学翻译上,台湾偏好译介欧美的作品,又受到日本的文化影响。大陆改革开放前俄国作品译介较多,而后亦转向欧美。俄国与日本是两地差异不可小觑的历史文化媒介。

台湾地区初时查禁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大陆学生耳熟能详的《阿 Q 正传》、《孔乙己》,在戒严前的课本中“查无此人”,但仍有途径能够看到,如作家施淑所说:“从被禁绝不了的鲁迅等少数作家的断简残篇,窥测文学史。”(邱贵芬等,2007:203)而课本中的现代作品泰半为符合当地政府意识形态的作家如纪弦、琦君、余光中、梁实秋、林文月等所作。而这些作家在大陆的早期课本中,亦是无影无踪,但随着两岸开放交流,中国学界的欧美潮流与台湾合流、相互取经,译作流通越来越频繁。可同时,两岸皆越来越受制于资本主义、英美全球化的文化殖民,是以文艺界皆有后现代、后殖民、通俗文化研究等趋势。总而言之,这些历史脉络的分流合流皆是“异域的考验”。

四、两地译者与译本相关探讨

大陆的三种译本,分别为 1961 年孟安的版本、1985 年郭宏安的版本、与 2002 年柳鸣九的版本。孟安生卒难考,但就其作品年代,仍代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陆译本。柳鸣九此书出版较晚,但其与郭宏安活跃于文坛却都在 70 年代末以后,因此本文将其二人归于 80 年代的文本。

孟安各方面的资料不详,翻译立场只能就此一书寻找线索。出版页最后一行标示着内部发行,可能为“文化大革命”前非正式出版,仅供高级干部参考的地下读物;前黄皮书。尽管批判性阅读,孟安的《局外人》“号称”名列四十本影响“文化大革命”一代最深的文艺书。

“文化大革命”那代人所阅读的图书,不外乎马克思列宁主义列、毛泽东文选、苏联、中共革命文学作品以及批判阅读部分中国和欧美作品。因此图书审查与管制相当严格,大约区

分为:供内部参考、内部读物、内部发行与限国内发行。

此外,于出版说明与附录中,当代官方主导之意识形态亦相当强烈,将加缪斥为反动分子,强调《反抗的人》之政治不正确,而《局外人》更是充分体现反动哲学,主人公被指出“精神世界苍白混乱,对一切既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无所谓苦恼、怨恨、抗议,总之,是一个没有感觉的冷血动物”。但由于此书在法国盛名远播,因此说明中告诫道:“西欧文化反动腐朽贫乏已到了怎样的程度。”其附录原载于苏联《文学问题》的一篇论文《存在主义小说的前途》,但编者将其改名为《关于加缪》。此篇文章用字情绪化,不仅否定其文笔、作品,更全盘否定其思想、人格。总而言之,此书于当时乃所谓的“反面教材”。

关于此书的译者,郭宏安(1943—)乃著名的翻译家及学者,其所译之波德莱尔、加缪、及《红与黑》已被视作近代翻译文学中的经典译笔(许钧,2001:102)。郭宏安于 1977 年留学归国,发现国内对于加缪仍所知甚少,尚存误解。而留学时他已阅读、研究过加缪部分著作,特别属意其人品及作品。因此于 1985 年出版了《局外人》、《堕落》、《流放与王国》三篇合辑的《加缪短篇小说集》。不仅如此,于其文中亦多有相关论述,论文集《从蒙田到加缪——重建法国文学的阅读空间》(2007)中,关于加缪就有十四篇之多,《局外人》独占四篇,以文本评析为主,加以介绍加缪的“风格论”。于《雪泥鸿爪》(2002)评论散文集与《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许钧,2001)亦皆有提及。他阐述加缪的“高贵风格”为:一、自觉追求。二、文学乃作家为纠正现实的真实。三、形意兼备、节制笔墨。

在众译者中,郭宏安翻译论述最为丰富:译者应将己之姿态降低于原文,始能客观翻译、将原文忠实引渡至本国。其称翻译应“自设藩篱,循迹而行”,意为以直译为主,反对译者“得意忘形”或胡译出“言外之味”。他另外指出译文必须既备洋味又符合中文习惯,当今

中国读者已不再满足于归化句法,其甚至言道:纯粹的中文已不复存。而与此同时,他又说道,今日翻译中并无太多照本宣科的欧化句法,倒是部分译作中成语与习语泛滥。

“风格”传译乃其眼中之最高境界,他表示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不断揣摩原作风格,“以形取意”扩充中文,因此他反对滥用成语与习语(郭宏安,2007:348)。他将此视为语感与口吻的转介,虽不至全然传达,但必定全力以赴。又如他曾提过自己翻译《红与黑》,乃紧握原著瘦硬之风而下笔。可见无论文学研究或翻译,郭宏安皆相当注重文笔风格。

至于中国的翻译理论,郭宏安以为,自西学东渐以来虽不断推陈出新,但不外乎乃严复“信、达、雅”之旧壶新酒,而其本身亦主张将此赋予时代解释,如“雅”乃是文学性,而并非文字上的雅俗之辨。至于翻译批评方面,其主要认为不应以纠错为目的:名家的成败自有其意义,生手更该予以鼓励。

柳鸣九(1934—)为著名学者与翻译家。著述虽繁,但翻译方面论述乃吉光片羽。如为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作序,以及一篇关于翻译的抒情散文《我译都德》。2002年,由法国文化机构赞助,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七星文库全数译,一套四册的《加缪全集》,柳鸣九为主编,执牛耳作总序并翻译了《局外人》。2004年浙江文艺社出版了柳鸣九的《局外人》与丁世中的《流亡与独立王国》(即流放与王国)合辑,附有柳作《〈局外人〉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涵》一文。此书于出版序中强调:为符合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综观2002年与2004年的序言及附录,柳鸣九对作者与作品的剖析如下:

《局外人》乃作者首屈一指的作品,全文讽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特别是法律抹灭人性的一面,人生的荒谬感因此油然而生。加缪一生政治左倾,因家贫而体悟到社会主义的重要,而后反对共产党、发表《反抗者》、与萨特决裂皆因时势所迫、身世所逼(阿尔及利亚成长):

俄苏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极权主义、法共处理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失当等等。柳鸣九以为,30年代左倾的法国作家,于布拉格之春之后,个个对共产党都十分失望,相形之下,《反抗者》只是突发事件,加缪之后亦有其他支持共产党的举措,因此最终柳鸣九仍将其归于“不附着任何实体阵营的自由的左倾的思想家格调”。由此可见,虽已改革开放良久,但柳鸣九的评述仍然十分注重政治正确性,这或许与其成长年代有关,也或许因为此作曾经为反面教材,势必得经过一番拨乱反正。而文中柳鸣九引述罗杰·格勒尼埃的《阳光与阴影》,说明《局外人》中注入了1940年加缪到巴黎的“异己感、陌生感、一切与己无关的感受”,倒可为台湾《异乡人》的题名作另一番注解。

台湾方面,此书译介频繁良久,但六七十年代皆无法语译本,直至1982年,始有莫渝的版本,而后三个译本分别为:1999年阮若缺的版本、2000年颜湘如的译本、2009年张一乔的译本,皆为90年代后的译作。四个译本,两个世代。

莫渝(1948—)本身为诗人,译作以诗歌为主,亦特别强调诗歌与翻译的联系。在《异乡人》的序言中,他举出现代诗作中三种不同文学意义的异乡人:一、为商禽的《籍贯》(1957),具有波德莱尔风格的异乡人(*L'Etranger, Petit poèmes en prose*, 1862)。二、如向明(1957)、苏绍连(1975)以及其自己(1971)曾以异乡人主题做过的诗,浪子(*bohème*)精神的异乡人。三、以加缪的《异乡人》为主线的,他只举出了周鼎的《异乡人》(无标日期)。

2009年5月,莫渝于台湾中央大学法文系有一专题演讲,仍紧扣法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联系,爬梳了自李金发以降,法国诗歌的引介情形,及其所造就台湾诗歌、文学、绘画之涟漪,其中更是将《异乡人》与《恶之花》、《小王子》并举为台湾长久以来最受瞩目的文学——译介最频繁、创作互文性最丰、读者人数最多。

至于译者立场与计划方面,译者于出版序